

# 地域文化与现代作家的精神路向

——以民国时期南京为例的一种考察

杨洪承\*

**【摘要】** 民国时期的南京,人与城、人与事、人与历史交织融汇于一体。此间,在现代作家笔下产生了许多名篇佳作,这些作品都被列为永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留存下来。它们不只是现代作家人生追求的印痕记录、时势艰难的历史剪影,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创作的素材,一类文体的样式,或者作为一种现象的文学史存在,而是一种特殊历史、特殊地域文化,呈现了现代作家内蕴极其丰富而纷繁复杂的文化精神理路,并由此形成了独特地域文化的丰韵和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在这种思路和地域文化的理念指导下,重新阅读现代作家作品,勾勒出一幅具有典型地域色彩的文学史图景,探寻现代作家某些精神生成演变的路向和缘由,以此力求贴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原生态。

**【关键词】** 地域文化;民国南京;现代作家;精神路向

将民国南京与现代作家作为并列的话题,两者涉猎的内涵和外延相当宽泛,是很难言说清楚的。如就现代文学史而言,因为真正可以隶属为民国时期南京的现代作家确实极少。我的印象中出生地是南京的现代作家不多,好像只有张天翼、无名氏(卜乃夫)、陈梦家几位。可是,他们虽然出生于南京,但籍贯分别是湖南湘乡、江苏江都、浙江上虞。而真正称得上是南京人的现代作家似乎也只有叶灵凤、卢冀野、杜谷等少数几人。现在微信上经常传播的104位民国作家无一位是真正的南京人。可见,作为纯粹地域性南京的现代作家,在现代文学史(或曰民国文学)中,并不占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南京与现代作家的联系已经不能仅仅简单地考察其籍贯或出生地了。漫步南京的街头,无处不在的是民国南京的身影,乃至六朝古都南京的历史遗痕。而南京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很难与近现代作家区分开来。走进民国文人的生活、现代作家的文学世界,可以说还很少有现代作家不和南京发生关系的。民国文学中的南京记忆、南京想象、南京书写,以及南京的人与事,是那样丰富多彩而又充满着历史的活力。现代作家对民国南京独特的生命体验,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更是一代人精神思想的记录。显然,“民国南京与现代作家”的话题具有的巨大空间和文化历史资源,不是以表面孤立的地理概念的南京城市,才能够决定其意义和价值的。从这一话题出发,我们可以打开一个文学与文化、人与事、空间与时间互动开放的学术视界,为现代许多作家多彩人生涂抹重重的一笔,也为现代

\*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97。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社群结构和作家谱系研究”(14AZD080)阶段性成果。

文学史另一种书写创造极有特色的鲜明案例。

## —

先看“民国时期南京”特殊的时间和空间。自晚清以来,实施督抚制,分管江南三省的两江总督府驻江宁,洋务运动又使得南京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城市,比如江南水师学堂就设于南京。“民国”概念的历史时段应包含于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政制之中,即最初的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再就1927年大革命后,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整个南京城,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我们传统上一般以1949年中共建国为界线,对这一历史时段给予了社会政治形态的划分,即新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或笼统的历史断代之划分,即近代与现代,或纯粹为时间表述的20世纪上半叶。而实际上,对中国这一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政治事件和生活变革的书写和叙述,往往与治史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眼光紧密相关。这本属正常,历史“假如具有某种意义而不是一种空洞的回声”<sup>①</sup>,她应该是既有主流意识的政治导向,还有个人理解的兴趣爱好,双向同构的鲜明历史当代性。历史有主流的宏大叙事,也一定有鲜活的历史细节和个体言说。

南京与这一时期现代作家关联之特殊意义,多少包孕着历史书写中不可避免的双重或多重因素融合的案例。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不说古代称龙盘虎踞之地、帝王之宅,就实际地貌位于长江下游沿岸,南北重要的交通枢纽,与近现代政治文化的中心交替存在相融合,形成了一座历史厚重和人文情怀饱满的特殊城市。这中间诸多近现代作家或民国文人在此留下了行旅匆匆的足迹,也留下了用心感怀体验的城市想象和城市记忆。他们笔下的南京“印象”、“闲话”、“颜面”或是时势变迁之抒怀,或是金陵市井“领略六朝烟水气,莫愁湖畔结茅居”随笔杂感的议论。每一个现代作家的行文,表面上是楼阁庙宇、湖光山色的城市景观描摹,而文字的背后都流淌着一种感怀之情,有一个无法言说又不得不说的精神之魂灵跃动。由此,南京与现代作家超越了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地域概念。她是融入文学世界的人与时空之想象,丰富了南京作为重大事件发生地的历史内容,而作家富有个人体验的南京叙述,提升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思想文化意蕴,也从某一个侧面透视了作家精神变迁的另一路向。

从此意义上说,这些年重提“民国”称谓,目的即在于淡化党派立场规约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意识形态,也试图避免地域与历史时空的政治隐喻的片面。这是当今社会和谐、党派政治对立减弱、海峡两岸紧张关系舒缓、学术也随之宽松使然。当然重要的不是称谓的更换调整,而是敬畏历史、尊重历史自身的特性、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是一切认识论和价值观的基础所达成的共识。由此,重构“民国时期南京”的概念,多元因素存在基点的文化反思,除了时间边界、历史风云、地域特征的厘清外,最难的是其中无处不在的政权更替、政治隐喻和市井人生、日常生活之融合,和纠缠的人与事的辨析。现代作家与南京的关联,所折射细微而丰韵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脉络,对深入探究作家的独特经验世界不无意义,也可以为阅读现代文学史提供另一种崭新的思路。

## 二

这样,我们来小心寻踪“民国时期南京与现代作家”的点滴历史印痕。丰厚而悠久历史、传统文

<sup>①</sup>[意]贝奈戴托·克罗切:《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页。

化浓重的南京,是一座近现代中国开风气之先、政治风云变幻的城市。她经无数丰富而复杂的“人与事”编织、涂抹了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这其中因南京城之景勾连的现代作家或曰民国文人的事,应该是最为浓笔重彩的篇章。尤其在“城与人与事”的背后传达出交错的历史事件,可窥测的现代人内心复杂的精神世界,营造了别一样的“人和城”同构的现代历史文化景观,丰富了民国革命史、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的内容。

随意“海边拾贝”,翻阅现代中国文学史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回忆,“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七月,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了”。虽然这年南京乡试落第,他没有成为旧科举的秀才,但是受维新改良的《时务报》启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sup>①</sup>,南京之行对于陈独秀的影响可谓至大。1898年5月,鲁迅怀揣着母亲的8块银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sup>②</sup>。他来到南京,从下关上岸直奔江南水师学堂。正是从这里,鲁迅去了日本,走向了世界。1903年,周作人也来南京入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官费去了日本。在柳亚子的“自传”里,记述了他“1912年正月元旦,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成立,以雷铁崖之介,就职秘书”。1917年夏,青年张闻天以“科学救国”的理想从上海来到南京,进了刚刚创办才两年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并在这里接受了《新青年》的思想启蒙。受1919年五四运动影响,《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出版,张闻天是这个八开小报纸的主要撰稿人,短短的七、八两个月里,就在该刊发表近三十则杂感,这中间有不自觉地对《新青年》“随感录”体式的模仿。1922年1月,《学衡》杂志创刊,编辑部就设在国立东南大学。翌年,吴宓来到南京,与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的梅光迪等一起办刊物,组织了在五四新旧文化变革中独树一帜的文化派别——“学衡”,倡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sup>③</sup>,以守恒和融合之立场,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之现代性的转型。1924年前后,青年巴金从成都南下途中,因身体有恙客居南京,暂时入东南大学附中就读。此刻他阅读了大量无政府主义的书籍,该思想影响了巴金的一生;他在这里经上海去法国留学,南京也是他文学之旅的开端。左翼革命女作家丁玲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被捕入狱,很快就与冯达被秘密押往南京。在这里大约有两年的软禁生活,住过陪都饭店,后又搬到中山门外苜蓿园的竹篱茅舍。南京这段生活是丁玲不堪回首的人生之痛。这期间的1935年,革命戏剧作家田汉也被国民党关押在南京,软禁期间创作并发起组织公演了《回春之曲》《洪水》《械斗》等剧目。当时田汉、阳翰笙看望丁玲并送来戏票,丁玲说她“因为感情上很难受,无心去看就是了”<sup>④</sup>。1940年的抗战期间,日本扶植的汪伪政权(南京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作家张资平、胡兰成等在伪政权供职。1946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以汉奸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直至建国,期间有旧体诗集《老虎桥杂诗》一册。

如果说上述与南京发生关系的现代作家点滴经历,呈现了民国文化文学发生发展的一个侧影,是时代政治风云人与城中折射沧桑历史的零星碎片,那么存留于现代作家作品中的大量南京记忆和生活片断,汇聚了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牵引出作家另一条精神线索。且不说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朱自清、俞平伯两位作家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以及朱自清的《背影》等名篇,就是那些不胜枚举的记述南京的现代游记散文,如石评梅的《金陵的古迹》、孙伏园的《浦镇十三日之勾留》、陈西滢的《南京》、钟敬文的《金陵记游》、艾芜的《孝陵游感》、李金发的《在玄武湖畔》、陶晶孙的《随园坊日记》、郭沫若的《南京印象》、赵景深的《灵谷寺》等等篇什,不仅赋予了南京城文化历史的现代想象,而且是一座城市以其独有的历史文化滋润着现代作家精神品格的真实写照。似乎在表面上,

①陈独秀:《江南乡试》,《宇宙风》散文十日刊,1937年第51期。

②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5页。

③《学衡杂志简章》,《学衡》1922年1月,第1期。

④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第116页。

这些作品不过是南京名胜古迹或自然景观的记述和描摹,或者仅仅是作家一时片刻短暂驻足于南京的生活感怀。细读这些篇目不难发现两种精神情绪的自然流露:一是六朝古都,容颜旧貌,湖光山色,庙宇楼阁,作家笔下是那样出神入化,娓娓道来,无不触景思古而感叹。“阁楼虽平列无奇,但英雄事业,美人香草,在湖中图画,莲池风景内,常映着此种秀媚雄伟,令人感慨靡已!”<sup>①</sup>不妨再看钟敬文游鸡鸣寺陈述的意趣,“此时上下四围的一草一木,片云片石,都有一种新鲜的同时又是古旧、神秘的情趣。山上颇有古树,郁然围成小丛林。……她所以成了吸引游客的胜地,一半固为了风物的关系,但古色斑斕的历史的彩色,是尤其来得有力的原因”。二是现代作家慕名而来南京时,游览名胜、观赏山水流连忘返,可是又无不行色匆匆,大家都是客居的漂泊者。南京是值得流连的地方,又是旅行者不得不离开的城市。如著名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写尽秦淮人家、小桥流水、交辉灯月、泛舟情趣。虽然各有高低,但是结尾传情同调。俞平伯感叹“灯火未阑人散”,“凉月凉风之下,我们背着秦淮河走去,悄然是当然的事了”。所有词汇着色淡雅,但又多少带有一些无奈和忧伤;朱自清的文章收笔直抒情怀,“梦醒了,我们知道就要上岸了;我们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民国文人一方面接续了传统士大夫的闲适洒脱、寄情山水之风,一方面又深深沉浸于难以摆脱的诸多现实人生的困扰。南京这座山水秀丽、历史沧桑,又是交通枢纽之地的特殊城市,既激发了现代作家许多怀古幽思、感叹人生的创作灵感,又多少可见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成长中传统人文精神的关联,及其与时代同呼吸共患难的现代意识生成之一斑。

自然,南京丰腴的经济和人文底蕴,源远流长,古人定为“两江”督抚地,今人划为经济开发的“长江三角洲”,并不只是为新文学作家提供创作的素材,民国作家也非仅仅都是为了怀古、或为寻求诗意而着墨。民国南京还活跃着一批现代学者、文化报人,他们在文学文化之间营造了南京城既古老又现代多重身份的民国韵味。现代作家的南京书写,还可见一条现代教育、现代报刊媒介生成与都市现代化进程的线路。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民国南京文人精神内蕴的文化取向。

胡适、陈独秀赶考乡试的点滴文字,勾勒了南京夫子庙江南贡院封建科举制的一缕余辉;周氏兄弟受惠晚清新政下江南水师学堂附设的南京路矿学堂的经历,是其开启新思想的最初摇篮。在这里,鲁迅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sup>②</sup>。而在现代教育的兴起之初,南京各类新型现代学校之多可与新文化中心的京城比肩。东南大学及其附属中小学,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各自均有办学特色,开民国初年现代教育界风气之先。1923年女作家石评梅南下旅游,写了一篇五万余字的长篇游记《模糊的余影》,连载于《晨报副刊》上,其中将民国南京的学校一一细说。而梁实秋的印象是南京东南大学与北京清华大学“可以立在兄弟行的”,认为“东南大学确是有声有色的学校”,这里“没有上海学生的浮华气,没有北京学生的官僚气,很似清华学生之活泼朴质”<sup>③</sup>。这里流露出作者对两所大学最先接受的一种开明、宽容、律己的西方新人文主义思潮的自觉认同。同时期,与南京民国教育并进的现代文化传媒报刊出版业的兴盛和发展,又从另一个侧面呈现了兼顾作家与文化报人双重身份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之旅。自然,南京作为民国政府首都、抗战爆发及汪伪时期的政治中心,对这座城市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推进。这中间不可忽视逐渐发达的现代报刊业所起的积极文化作用。正是既报道重大时事新闻,又传播平凡市井人生信息的现代报刊载体,将一个风云变幻的南京城之历史面影,与一些民国作家、文化人的精神、生活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1911年,被誉为近现代报章文史掌故“补白大王”的郑逸梅写有《南京战后遗迹》,最早迅捷记录了八国联军侵占南京的情形。民国之初,已是《申报》特约通讯员、被称之报界先驱的邵飘萍,在《申

①石评梅:《莫愁湖》,丁帆编:《金陵旧颜》,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69页。

②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486页。

③梁实秋:《南游杂感》(5),《清华周刊》第280期,1923年5月4日。

报》“杂评”栏目刊发《南京大掠》《江苏之两问题》等文，反映1913年“二次革命”前袁世凯反叛军的掠城。1919年，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连载十则《寓宁杂感》，第一则就借南京电灯偏是黑暗的现象，抨击政府的电灯厅为官不办实事，“这主事人对于该厅发达不发达完全不负责任。他们只要每月多少薪金去供给自己的姨太太等挥霍罢了，至于舞弊等情，局外人不得而知”。1927年曾与鲁迅关系密切的民国文人荆有麟在南京办过《市民日报》，写有《南京的颜面》一组文章，虽多为市井生活的断片拾零，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此刻南京“千篇一律”、“墨守旧法”的新闻报纸，“昙花一现”的杂志之不满。1929年9月，陈铭德等人在南京创办《新民报》，“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抗敌御侮的言论和宣传报道大得人心。报纸的影响迅速扩大，一个月内发行数由二三千份上升到一万多份。1944年前后，现代著名通俗报章作家张恨水在《新民报》连载一组描写南京故事的《丹凤街》和散文随笔《日暮过秦淮》《清凉古道》等多篇作品，呈现了南京市社会日常生活独有的旧街、马路和米店、酱坊之特征。新闻记者、作家范长江，抗战初期有《感慨过金陵》的长篇通讯，抗战后又有《南京的歪风》等作品，均能够见到作家以通讯报告与文学感悟结合的特殊体式，对战时南京人苦难生活的直接描摹和实录。而学者型作家黄裳虽也是为新闻写作，但多为读书有感，或记叙文人史话书话等。他写作与南京有关的《白门秋柳》《旅京随笔》《老虎桥边看“知堂”》等文章，有别于其他作家同类文字的情怀和风韵。抗战中，杂文家、文学史家唐弢署名晦庵在《万象》上发表《帝城十日》，是他途经南京的记叙，虽为短文但却满纸“劫后山河”的感怀之痛，也极有代表性。还有时任南京市文献委员会“通志馆”馆长的卢前（冀野）主编一本《南京小志》，撰写《冶城话旧》《鸭史》《织造余闻》等文。卢前作为地道的南京人，自称江南才子，描写南京的人与事、情与景，文笔风趣活泼，而文中大量史料的整理和考辨又不失学者的严谨。

### 三

综而述之，散落于现代文学史中一大批各式各样书写南京的作品和文字，真实记录和描摹了历史上地处长江要塞的古都南京饱经风霜之容颜，也最为鲜活地留下了民国文人与这座城市千丝万缕联系的精神路向。归纳起来能够给我们启示的是：

其一，地域作用于现代作家精神的生长，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而仅仅是一段短暂的人生居住地或与亲情关联之地，南京是一个可以打上他们思想烙印的城市。民国南京留下了许多现代作家难以释怀的精神流痕。鲁迅、陈独秀、郭沫若、梅光迪、巴金、丁玲、张爱玲等一批现代著名作家，尽管他们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文学、思想、文化的评定，可是要想完整地考察他们思想精神生成演变的脉络，南京是他们不可绕开的城市。且不说南京之于周氏兄弟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和新知识的开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有所谓的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sup>①</sup>。还有南京之于青年巴金的，是他“终于离开了我在那里生活了十九年的家，但是我从一个小圈子出来，又钻进了另一个小圈子”<sup>②</sup>之新世界新城市。也正是在这个时段中，巴金着迷地阅读翻译俄国作家克鲁泡特金《告少年》、《面包与自由》与波兰作家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等书，接受了安那其

<sup>①</sup>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6页。

<sup>②</sup>巴金：《巴金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20页。

主义。而南京之于丁玲的,是其自传中一段不愿提及的被秘密拘押地,那是她从事革命来第一次经历的人生巨大低谷。她以后每每提到的只是“我当时也不愿意有人来探望我,……我当时的心境变得喜欢孤独”<sup>①</sup>。民国南京之于这些作家,只不过是他们漫漫人生之旅中的一个极短的停留地,甚至也不是他们可以认同的第二故乡。但是有谁又能够否定在南京的这一短短的人生片断之经历,对于他们一生的精神思想的建构没有关系呢!鲁迅“顾不得”、“才知道”、“又知道”的用词表述,与巴金“终于离开”和丁玲“喜欢孤独”,这样的直言无不传达一种最真切最独有的文化心理状态。完整考察他们一生丰富而复杂精神思想的构成,自然不可抹去这段与南京城市相联系而衍化的独特精神心理状态。南京对于现代女作家张爱玲,仅仅为祖父母生活的城市,但是她的小说《十八春》《小团圆》和散文《流言》《对照记》等作品中,弥漫着浓浓的南京记忆与想象融合的城市叙述,构成了独有的城市文化视角,反观出女作家心灵深处的感伤情怀、“苍凉”风格,与其地域、家族文化的密切联系。由此,民国作家、文人的生活、创作于南京城市浓墨重彩的一笔,其精神痕迹与他们的活动和住地一起,也成为了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文化地标,后人不可忘却的文化历史遗地。这使得当下人们每每在寻踪鲁迅就读的南京水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旧址、巴金就读的东南大学附中、张爱玲的祖父故居、曾经关押过周作人的南京老虎桥监狱等遗址过程中,获得的何尝不也是一种现代文化精神的传承呢!

其二,地域对于现代作家产生影响的,自然不只是留下或多或少的精神思想痕迹,而且更多是地域空间给予现代作家极为丰富的创作资源。南京就是一个最具有传统与现代人文精神交融活力的特色城市。俞平伯、朱自清、陈西滢、梁实秋、石评梅、钟敬文等一批现代作家所作大量散文随笔杂感类的作品,不乏有纪游山水古迹、叙述地域文化、描摹城乡风俗风貌的文字,但是他们重要的不是单一景象或具体空间的呈现,而多为借景抒情。比如民国时期南京在他们的创作里,与其说是写他们对南京古城幽深文化、名胜古迹的热情眷恋,对自然风光的赞许欣赏,倒不如说这一座城市独有的山川风貌引发他们对于现实人生的抒怀。除了上面提到现代作家朱自清、俞平伯著名的游秦淮河问题散文各有不同表述和情趣外,随便翻阅现代作家散文作品选集,那些文字的背后无不饱含现代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的感怀,对于时势、人生的隐喻。1929年袁昌英的《游新都后的感想》,是民国南京刚刚定都后的游记。作者一面写古金陵的鸡鸣寺、台城、明孝陵等旧遗,一面记述尚未竣工的中山墓陵纪念胜迹,溢于言表的虽然是一次匆匆的瞻仰,但是与回到“尘埃满目、钱臭通衢的上海”相比,心中对新旧名胜的南京都城“到处花香的美貌”有着无限的“怀慕”。1936年储安平《豁蒙楼暮色》<sup>②</sup>描写“大好江山,如一片锦绣,全铺展在我的脚下了,可惜四边迷雾隐约,已不易辨识”,暗示作者此时此刻的迷茫心境;而1939年邓启东的《豁蒙楼上话南京》<sup>③</sup>娓娓道来古今南京七大特色,但是难抑现实的感叹,“现在的南京呢?已经遭受了它空前未有的侮辱,被倭寇铁骑践踏已十二个月了”。在南京名胜的同游中,两位作家都借“豁蒙楼”上悬挂的梁任公书陆放翁诗句“江山重叠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倾诉感怀。现代作家身上浓重的传统文人情怀,一方面闲淡优雅于山水、书斋,一方面又难掩时世动荡之忧患。生于乱世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多呈现出两难困境的矛盾之精神谱系,全由他们有意无意间记游南京、怀古六朝遗迹中一览无遗。反之,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及其贯通南北的重要交通地位,形成了它独特的城市品格,某种程度上也正是构成现代作家精神成长的特殊文化资源所在。

其三,特殊地域的意义,往往与地理环境的特殊历史事件,及其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其地理空间的文化判断、认知密切联系。风云多变、时势动荡的民国南京又造就了现代作家、文人一种独有的文化精神向度。与传统文人侧重情景渗透交融的地域书写不同,郑逸梅、邵飘萍、张恨水、范长江、黄裳、卢

①朱正明:《丁玲在陕北》,载《女战士丁玲》,《每日译报》1938年12月。

②储安平:《豁蒙楼暮色》,《新月》1933年第4卷第7期。

③邓启东:《豁蒙楼上话南京》,《中央日报》1939年9月21日湖南版。

冀野等民国文人更多贴近时代生活的南京直接呈现。他们迅速报道记录民国南京政治文化、历史事件的潮起潮落,逼真还原、纪实平常百姓生活的点滴琐事。张恨水与张爱玲都在小说中写了南京的城与人,但是小说《丹凤街》与《十八春》的不同在于,前者重“其每个人之性格与姿态,则予当年住丹凤街畔,有似摄印于脑中,今特融化为故事中之角色以使其逼真”,“欲能他日回归丹凤街头,访其人面谈之”<sup>①</sup>。而后者更多是作者难以释怀的家族记忆,以及与这座城市不可割舍的情缘情思的精神想象。抗战初期,现代作家范长江的《感慨过金陵》,书写了正在经历迁都之痛的南京城谣言四起、交通混乱、物资贫乏,以及人心的恐慌,无望的茫然:“汽车租用一空,公家汽车和私人汽车,一齐在街上紧张地跑,马车从鼓楼到下关,涨价都五元”。这不仅仅记录了不同以往作家笔下另一面影的南京,而且以特有的报告体式纪实了时代的声音:“为了抗战,为了保障我们自己 and 子子孙孙不作奴隶牛马,我们要求刷新政治机构,要求舆论有批评政治腐败部分的自由”<sup>②</sup>。显然,正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浸透了这一特殊地理空间的南京城市,从而凸显了现代作家敏锐触觉、感怀时势的另一种精神气质;表现了现代作家丰富文学审美的想象力,源于一种情理兼备的精神特质,创造出杂感、新型报告文学和新闻纪实故事等现代文学的新体式。他们笔下常常将文学记忆和真实生活的实录、市井平凡人生和历史重大事件的记述——杂糅、汇通,这恰恰是双重或多重精神缠绕现代知识分子智慧而诗性地直面现实人生的反映。追究其因,正是饱受风风雨雨的政治动荡,斑斑历史沧桑的文化遗痕之民国南京,影响和提供了他们具有这样精神取向的可能。

许多民国文人一次次来往于南京,都有一种理解不透的感觉。作家荆有麟说:“这自然是南京的伟大处,同时也是自己的渺小。”<sup>③</sup>一个城市的历史容颜能够折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灵史。南京城与现代作家许多特殊的存在,可否作为史的一个案例呢!

(责任编辑:邓晓东)

## Regional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of Modern Writers: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Case of Nanjing during Republic of China

YANG Hong-cheng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ity of Nanjing was a place where there was a full integration between people and city; people and events; people and history. In this city, modern writers in China produced many renowned masterpieces, which are listed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se works are not only more than a record or trace of their personal pursuits in their life and a sketch of life in the difficult times, but also more than a type of materials for literary creation, a literary genre, or a phenomenon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They actually form a special type of history and regional culture. Showing a rich and complex ideological world of modern writers, these works make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Nanjing unique in elegant profundity and serve as a cultural landmark of the city. Guided by this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writers and the regional culture, we can sketch a landscape of literary history characterized by regional culture and explore the course of the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writers through re-reading their works so that we can get closer to the original state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regional culture; Nanjing during Republic of China; modern writers;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①张恨水:《丹凤街·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页。

②范长江:《感慨过金陵》,丁帆编:《金陵旧颜》,第212页。

③荆有麟:《南京的颜面》,丁帆编:《金陵旧颜》,第167页。